

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系列

中国散文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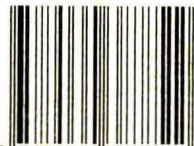
下

范培松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 → 徐宗文
装帧设计 → 张金凤

ISBN 978-7-5343-8772-2



9 787534 387722 >

定价:108.00元(上、下卷)

中国散文史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散文史/范培松主编. —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
2008. 7

ISBN 978-7-5343-8772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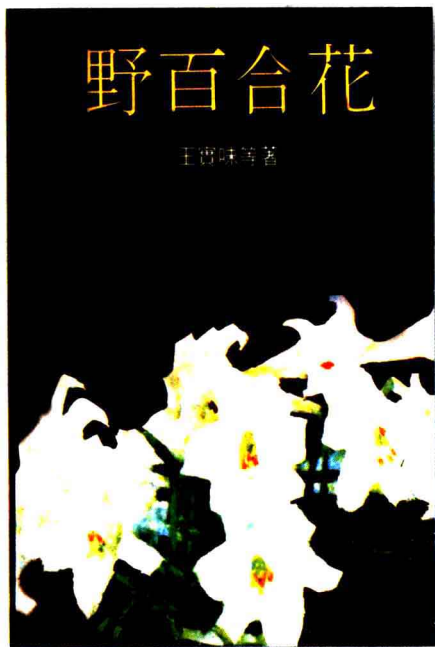
I. 中... II. 范... III. 散文—文学史—中国 IV. I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466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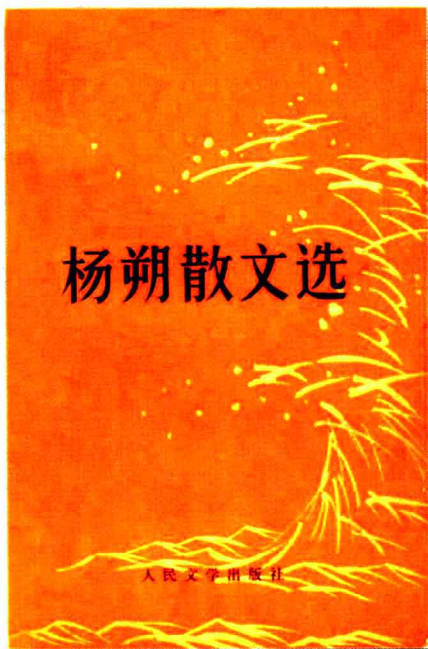
- 书 名 中国散文史(上、下卷)
责任编辑 徐宗文
装帧设计 张金凤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(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厂 址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 28 号(邮编 215557)
电 话 0512-52391383, 52361778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58
插 页 8
字 数 1015 000
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43-8772-2
定 价 108.00 元
批发电话 025-83260760, 83260768
邮购电话 025-85400774, 8008289797
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
E-mail jsep@vip.163.com
盗版举报 025-8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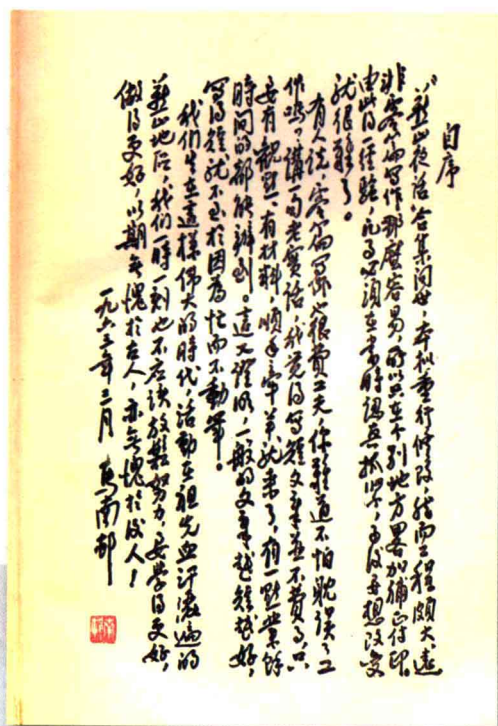
《野百合花》书影



《杨朔散文选》书影



丰子恺散文《阿咪》插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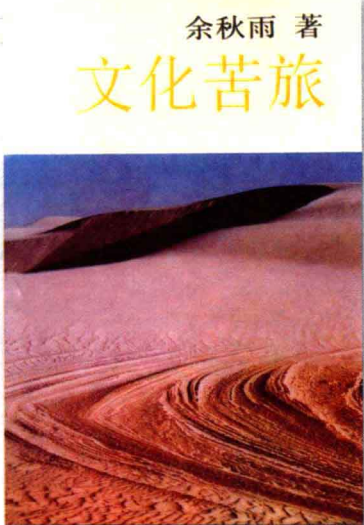
邓拓手迹



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



1959年巴金同萧珊（中）在新安江



《文化苦旅》书影



贾平凹和周涛（中）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合影



史铁生近照



《梦中的天地》书影



董桥近影



《学术上的老人与海》书影



《香港方物志》书影



余光中和夫人攝于西班牙的小巷



《田園之秋》書影



下
卷

第三编

消融聚合

(40年代中期—80年代中期)

第十四章 “工农兵”代言人时代的散文

第一节 角色转换：“工农兵” 代言人的提出和确立

一 角色转换的艰难：王实味的《野百合花》及其批判

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，在近半个世纪中，中国大陆的散文进入了“工农兵”代言人的时代。诚然，它有前后期之分，可以七十年代中期“文革”结束为前后期区分的标志，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后“工农兵”代言人时代。

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，这是树立权威的时代。战争是权威，党派是权威，枪杆子是权威，权力是权威。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，整个中国处在国共对立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中。阶级斗争以战争的形式出现。战争主宰了一切。散文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必须作出选择。其实在之前，这一选择就已经严峻地摆在面前，四十年代初，发生在延安的文艺整风，就是要求散文家作出新的选择。

当时代车轮刚刚驶入四十年代，毛泽东就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。他在1940年1月延安创刊的《中国文化》上发表了长篇论文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用大量的篇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和立场，指出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，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，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，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”^①。尽管这种立场表述是纲要性质的蓝图描绘，但有一点是具体的，清晰的，而且是毫不动摇的，就是新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：“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，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；在今日，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。这种文化，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，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。所谓新民主主义的

^① 毛泽东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，第669页。

文化,一句话,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。”^①这里的“无产阶级领导”是非常落实的,具体的,其含义应是管理,指挥,服从。毛泽东坚持的是两条,一条是党指挥枪,另一条是党指挥文化。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,文化必须服从党派和权力的权威,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权威,散文决不能例外。

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当时延安作家的足够重视。从延安作家队伍的结构来看,大部分是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,跟随武装部队从江西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极少,这一结构决定了他们对延安的认识心态上的差异。作为当时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和领导者来说,他们是九死一生,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,最后终于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,延安是命根子,他们已无路可走。而且延安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围困之中,在战时特定环境下,延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。再从权力管理系统来看,从中央到地方,体系非常严密,形成一种国中之国的割据局面。这种割据,决定了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,并理所当然地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延安发生的一切,以确保政权的巩固。延安的安全和稳定高于一切。对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来的大批作家来说,他们的心态不同。他们是满怀激情,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来到延安,他们把延安视为理想的王国和完美的圣地。作家们又非常敏感,他们在延安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另一面,那就是等级制度、干部庸俗的心态以及享乐主义等等。作家们把理想和完美视为高于一切,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。王实味在《政治家·艺术家》中就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冲突:“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,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;另有些人以艺术家自高的人,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。其实,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,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是镜子照一照自己。不要忘记: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的儿女呀!”^②

倘若冲突双方仅仅是“冷讽的微笑”和“耸耸肩膀”,事情就简单多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其严重和残酷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,在近半个世纪里酿造了许多冤案。而发生在四十年代初批判王实味的这场冲突,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。

冲突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。

事情的缘起是在1942年春天,当时丁玲主编的《解放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

① 毛泽东: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卷,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,第659页。

② 王实味:《政治家·艺术家》,《谷雨》1942年3月17日。

王实味、萧军、丁玲、艾青和罗烽等的杂文。王实味(1906—1947),河南潢川人。1922年入北京大学,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。抗战前夕去延安,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。他在1942年3月13日、23日的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杂文《野百合花》,在1942年3月15日《谷雨》上发表了杂文《政治家·艺术家》。萧军(1908—1987),辽宁义县人。早年就读东北陆军讲武堂,曾在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拟组织抗日义勇军,失败后逃赴哈尔滨,在哈尔滨与萧红出版短篇小说合集《跋涉》。1933年他和萧红逃到上海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由鲁迅亲自撰序推荐出版,声名大振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到武汉参加《七月》刊物编辑工作。次年去延安,后辗转四川,从事工人业余文艺教学工作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40年再赴延安,主编《文艺日报》。他在1942年4月8日《解放日报》上,发表了杂文《论同志之“爱”与“耐”》。丁玲(1904—1986),湖南临澧人。1921年到上海入平民学校,次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,读了一年左右到北京。1927年发表处女作《梦珂》,接着发表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等,影响颇大。1936年逃离南京到达延安,曾任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,1941年主编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。1942年3月9日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《文艺》第98期上发表杂文《三八节有感》。艾青(1910—1996),浙江金华人。早年曾赴巴黎习画,后来开始写诗,1936年出版的诗集《大堰河》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,1941年辗转到了延安,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,主编诗刊。1942年3月11日,他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《文艺》第100期上发表了杂文《了解作家,尊重作家》。罗烽(1909—1991),辽宁沈阳人。1928年毕业于哈尔滨呼海铁路练习所。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在杨靖宇领导下担任哈尔滨东区委宣委,创办《文艺》、《夜哨》周刊。抗战爆发后去武汉,参与编辑半月刊《哨岗》。武汉沦陷后他去了重庆,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。1941年赴延安,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席。1942年3月12日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《文艺》第101期上发表了杂文《还是杂文的时代》。

这批性质相似的杂文在同一期间出现,显示了这样五个共同特点:第一,这批杂文作家都是抗战前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进入延安的,在到达延安之前,他们已有了较大的文名和声望,不是一般作家。第二,这批杂文都发表在延安最权威的刊物《解放日报》上,影响很大。第三,时间集中,都发表在1942年春天。第四,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延安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。第五,在文体上均是杂文,对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是以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方式呈现的。它们成了第一批公开发表的批评延安的意见书。散文的文体特征,决定

了它在这场冲突中充当了出头鸟的角色。

这批杂文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延安的阴暗面和黑暗面,揭露是无情的。以《野百合花》为例,它的要害是“野”。“野”在于它认为延安有“黑暗”,有些人“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,甚至直接制造黑暗”^①!尤其对延安“衣分三色,食分五等”的等级制度,进行了无情的批判:“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,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(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,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:吃得饱!),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‘大人物’,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‘享受’,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,对他们不惟没有爱,而且—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‘不安’的。”^②在这一点上,丁玲的《三八节有感》也作了同样的揭露。另外,《野百合花》还对延安缺乏“爱”,对一些干部只顾自身享乐,只顾自己的一点利益等庸俗丑陋现象也提出了批判。艾青、萧军、罗烽等的杂文也基本上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的,尤其是罗烽提出的“还是杂文的时代”成了这批杂文的理论依据和口号、旗帜。

如果客观来看这些揭露和批判,应该是可以容忍和允许的。但问题在于,它们的集中出现,在延安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有人还把王实味捧为延安的鲁迅。由于延安的政权和体制,是从江西根据地延续而来,是以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。战争环境中凭借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,从江西到延安,从来没有任何人(包括作家)对这一权威发动批判和挑战。而且这种权威在战时环境中保持高度警惕。罗烽在《还是杂文的时代》中说道,“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的最高的地方”。因此,对延安政权的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,尤其是它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效应,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。后来在中国共产党“七大”期间,毛泽东对这一局面曾作了这样的评价:“1942年,王实味在延安挂帅,他出墙报,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。他是‘总司令’,我们打了败仗。我们承认打了败仗,于是好好整风。”^③文学问题一下就转化成政治问题。1942年5月,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,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。从5月27日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对王实味、丁玲、萧军、艾青、罗烽等进行批判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政治手段,动用权力来解决文学问题,开创了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的先河。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,成了敌人。丁玲作了自我批判。王实味最后以“反党五人集团”和托派问题被捕,并于1947年被错误地处决。

①② 王实味:《野百合花》,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,第9页,第11页。

③ 转引自戴晴:《王实味与〈野百合花〉》,《文汇月刊》1988年第5期。

这里特别要提一提,在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上,运用了群众批判的手段,它不同程度地动员广大群众参加,以会议的形式展开。如对王实味的《野百合花》、《政治家·艺术家》的批判,当时中央研究院开始以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。座谈会从1942年5月27日开始,到6月11日结束,共开了十六天,期间开了十四次大会。当时会议参加者对6月8日的座谈会作了这样的记述:“从早晨七点起,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,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(学校在内)。”^①一千多个人对一个人批判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!鲁迅曾说:“牺牲为群众祈福,祀了神道后,群众就分了他的肉,散胙。”^②不幸,鲁迅的话成了王实味等的谥语,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,中国大陆文坛上对作家和作品时常运用群众批判的手段。当群众在一种权威体制运作下,变成一种专制,一种暴力时,它就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。王实味等在群众批判下,完全失去了语言的感觉,因为群众批判重复着战斗的刺激的语言,形成一种声势、一种压迫、一种结论。王实味们终于败下阵来。

《野百合花》等杂文的出现,使毛泽东等人认识到,除了政治权威,军事权威以外,还要建立文化权威,而且建立文化权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于是,毛泽东发表了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对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提出的“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”中的“无产阶级领导”的蓝图开始了全面具体的规划。

二 “工农兵”代言人角色的确立:散文“非知识分子”写作时代的开始

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发表,对散文的直接影响是,要求散文家成为“工农兵”的代言人。“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,表现群众,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,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”^③，“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,首先是为工农兵的,为工农兵而创作,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”^④。这不是一般的文学评论,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的指示和号召,它并不是要大家讨论,更不是可以不可以执行的问题,而是必须坚决执行。散文首当其冲,它的文体特征,决定了在散文创作领域里,散文作家必

① 温济泽等著:《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》,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,第194页。

② 鲁迅:《两地书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75页。

③④ 毛泽东: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3卷,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,第821页,第820页。